



傅莹:我的“高尔夫外交”

傅莹从事外交工作数十年,被称为“中国最美外交官”。傅莹认为,外交的最终目的是为国家发展创造和维护一个好的外部环境,高尔夫球运动是一个比较好的外交工具。在球场上,视野开阔,置身于大自然当中,人的状态更为放松,谈话内容再严肃,听起来也多了几分委婉,即使是针锋相对的辩论,也不会显得硬邦邦的让人难以接受。

关于打高尔夫球对于外交的意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东盟)官员和部长们建立起某种工作方式,使争端即使没能获得解决,也不会公开加以宣扬,大家都逐渐养成一种合作的态度。他们会在见面协商时打高尔夫球,在挥杆间互探对方的观点和建议,即使意见被推翻,也不会像正式会谈一样出现争执冲突的情况。”

高尔夫球场上并非表面的一派和平,有时也暗藏机锋,李光耀就提到一个细节:“那天下午,我和奈温(缅甸前国家元首)在仰光高尔夫球场打球。这场球可真不寻常,每一条平坦球道两旁,围绕在我们四个球员周围的全是提着枪向外看的军人。不挥杆时,奈温戴着钢盔,我犹豫该不该问原因,其中一个球员是奈温的部长,他低声说是跟什么行刺威胁有关。”

类似情况我在球场上也见过。1999年我们与东南亚某国发生海上争端,我约了该国国防部领导在当地一家很有特色的中餐馆吃饭,但是双方谈得很不愉快,客人们没吃几口饭就离席了。外交官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坚持国家立场,同时,两国出现争端总需要找到解决办法。该国

时任总参谋长是我的球友,那个周末正好有约要一起打球,他如约准时出现在球场上。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带了4位持枪军人警卫,开着两辆双人座球车跟在一边,可能是想体现一种强硬态度。这天,我这边只是请了使馆的二秘王尼带着笔记本跟随,记录我们的谈话。

球场经理非常紧张,追过来对我说:“大使阁下,球场上不能见枪的呀,我要对其他会员的安全负责。”我安抚他说:“那可是你们国家的总参谋长哦。”

他说:“可他是您的客人啊!”经理为了不惊扰到其他球手,不得不延迟后面球组的下场时间。

这场球一开始就打得很不顺,谈得也很僵,分歧无法弥合。对方索性不再讲话,认真打球。我也开始把注意力放到打球上。高尔夫球的妙处在于,再差的球手也会有好运气打出漂亮的球,再好的球手也有可能出现失误。我们两个人越打越好,开始相互为对方叫好,大概双方的碰撞和不快在奋力挥杆击球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某种释放,总之气氛缓和了许多。

下半场,对方的球偏向哪边,我就刻意地也偏向哪边。

我与他在一个若即若离的范围内边走边聊。与在其他场合不同的是,在球场上不太会出现拂袖而去的情况,彼此能有更长时间交谈,蓝天绿草之间,该说的硬话说完之后,我们进入探知对方意图和底线的阶段,慢慢地大致找到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基础。在之后的一周,我与他多次通电话商议,将一个火药味儿颇为浓烈的事件逐步推向尘埃落定。

打高尔夫球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帮我交到很多朋友。我在澳大利亚任大使的那几年,时任澳外长亚历山大·唐纳也喜欢打高尔夫球,我们经常相约早上打9个洞的半场球,不影响各自去上班。

打高尔夫球时,心理因素对技能发挥的好坏影响比较大,比赛时,观众的一声咳嗽

都有可能对正在挥杆的球手造成干扰,谈事儿对打球肯定会有一定干扰,尤其谈到分歧时难免会影响到情绪。有一次我和唐纳谈到朝核问题,争论起来,结果他把球打到草丛里面找不到了,罚了一杆。那天他输了,有点儿恼,于是我们达成一项“君子协定”:前6个洞专注打球,打到最后3个洞时可以谈事儿。

国与国之间,摸清对方利益的边界很重要。唐纳外长身边有一位负责给他起草演讲稿的“笔杆子”,当他需要撰写涉及中国的讲话内容时,也会约我打球。我们边打边谈,我会尽可能多地给他介绍中国方方面面的情况,让他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政策和缘由。(摘自《大使衣橱:外交礼仪之旅》傅莹 著 中信出版社)

熊召政: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

我(著名作家熊召政)与金庸先生的交往,得益于潘耀明先生。我与潘先生大约是1999年相识于北京的一次会议上。那时潘先生担任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明窗出版社社长,是金庸先生的得力助手。翌年,趁金庸先生来京参加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在潘先生撮合下,我请金庸先生到一处小胡同里吃了一顿厉家菜。记得参加的人有王蒙、金坚范等。因为这次相见,就算是与金庸先生结识了。

每次去香港,只要金庸先生在,潘先生就会告诉他,他总会抽时间请我吃顿饭。有一次我接受金庸先生的邀请来香港,同时受到他邀请的还有台湾老作家柏杨、张香华夫妇,台湾远流出版社社长王荣文等。席间,我们畅谈历史文学的写作。其间,金庸先生郑重向王荣文先生推荐了我的历史小说《张居正》,这也是我的台湾版《张居正》问世的机缘。

宴请后的第二天,我前往金庸先生工作室拜访。在谈话中,金庸一再强调,他爱好不多,读书虽广,但最爱的还是历史书。他说,《碧血

剑》的修改中,多处涉及明史。《张居正》亦是明史小说,因此,我们谈话的主要部分就是明史。他问了我一些问题,如万历皇帝为何自张居正死后,竟40年不上朝?万历是不是中国第一个抽“谈巴菰”(即香烟)的人?李自成逃离北京撤退南方时,是否有过屠城的行为?《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将明朝的落后归结为没有用统计学的数据来管理国家,这观点是否成立?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后,他还就《张居正》的写作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他问到:“民间有一些传说,说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有私情。作为小说,你可以写,但你并没有写,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我说:“这种传说不足信,不可否认张居正喜欢女色,但他以辅嬴之尊,大可不冒那么大的政治风险去和李太后发展私情。在《张居正》写作中,我若使用这些不真实的传说,会降低作品的历史品格。”

金庸先生对我的这种写作态度表示了肯定和赞赏。(摘自《传记文学》熊召政/文)



收获与欢乐的“结算时间”

曾颖

李爷爷。

李爷爷是克勇的爷爷,是小院里不多的令我敬畏的人。事实上,他没打过也没骂过任何人,但总是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凛然感。他的话很少,但很有力。每一次喊克勇回家吃饭或做作业,声音轻柔但不容拒绝。每次,克勇都会乖乖地听话。这令包括我妈在内的所有邻居服气。对于玩得兴起的孩子们,不拿棒子、不扯耳朵甚至不用撕破嗓子的威吓就乖乖喊回家,实在令人佩服。

在我的记忆里,李爷爷对我说话不超过二十句,其中十五句以上是下逐客令。在他的眼中,我这种顽皮的孩子,是可能影响到他孙子健康成长的元素。

即便如此,他仍然是我敬重的那种老人。他说过一句让我牢记一辈子的话。那句话不是专门对我说的,而是劝隔壁

数年前,某个晚上我与家人散步路过江边,看见空地上十几个中老年妇女正兴致高昂地列队挥动四肢。放置在地面的小音箱里传出的,都是极少数民族风格的音乐,几十年前早就风靡过。体现在她们身上的,却是一成不变的僵硬比画,所谓乐感和舞感此

鞋子的力量

林那北

圈,竟又回到当初。一切都在重复,一切又如此迥异。我想荡起身子,但腰太硬;想挥动胳膊,但肩太紧。说到底不是鞋让人脚步趑趄重心不稳,而是鞋子的力量已经支撑不起几十年沉甸甸的岁月了。阅历让你眼高,衰老却让你手低。这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江边那些女人,她们也曾如花朵一般绽放过青春,如今再聚在一起且歌且行,无非是以一种松弛的心境,给必将更羸弱的躯体些许安抚,也给自己已经远去的往昔,致以幽远的怀念。(摘自《光明日报》)

红尘

雨天的街道是伞的国度,各色伞团团簇簇,像一朵朵蘑菇,撑伞的人,每一个都像在伞下撑起一个小小的世界。雨是一个小而完备的世界,一个敞开的封闭所在,一根隐身草,撑伞的人几近大隐隐于市,想起昨夜书中的事和梦里的人,幽杳如黄鹤。这一二十年脚步匆匆,如同古

雨天

储劲松

时边关来的露布,急急如律令,其实很愿意从容一些,把日子过得姜夔的《扬州慢》,过成一篇碎金屑玉的散文。

雨天,是生活的缝隙,是光阴的漏子,是一阙调子长、拍子缓的慢词,可以驰神走马,可以养气与器,也可以思无邪。(摘自《广州文艺》)

时光煮茶

此起彼伏的朱诞生
鸟鸣将我唤醒。
天没有亮,
空气中有轻微的风,

还有看不见的甜。我惊奇于东方在凝望中变白;我有幸窥见鸟鸣擦亮天空,紧接着又擦亮蜂箱,那么多的蜜蜂纷飞出巢。

侧身看了看枕边的你,那么安详,我不忍唤醒你,但知道你的梦境也将被擦亮。我沉醉于这神秘的时刻,心中涌起圣洁的激情。

多么美好,整个世界像一枚即将孵化的蛋,正被外面的鸟鸣轻轻啄开……

(摘自《星星·诗歌原创》)

诗情



长沙新时代文明先锋

有困难找志愿者 有时间当志愿者

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
长沙市文明办

宣